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 目录 (1840—1919)

陆国飞◎编著

*Catalogue of translated novel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840-191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 2013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13YJA870015) 研究成果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 目录 (1840—1919)

陆国飞◎编著

*Catalogue of translated novel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840-191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一共收集了自 1840 年以来到 1919 年为止在我国发表于报刊以及出版单行本的翻译小说目录,达 2900 多种,为目前国内单就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目录收集最全的目录文献著作。本书主要内容涉及每种小说的书名和部分原作名,作者、译者和部分译者简介、发表的刊物与刊年、出版社与版年、小说类型标注等信息,能为本领域研究者和兴趣爱好者研究中国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提供基础性研究材料和资料路线图。

目标读者为研究中国清末民初翻译史与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研究学者以及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目录:1840—1919/陆国飞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13-19812-9

I. ①清… II. ①陆… III. ①外国文学—小说—中国—1840—1919—书名目录 IV. ①Z88: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1011 号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目录:1840—1919

主 编:陆国飞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谈 毅

印 制: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479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9812-9/2

定 价:98.00 元

地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话:021-6407120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张:29.5

印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769-85252189

序

从时间上说,清末(也即晚清)指的是从1840年到1911年这一时段,而民初指的是1912年到1919年。从清末到民初这段时期,译介外国小说高潮迭起,译者人数众多,翻译小说种数接近3千种,居其他翻译文学样式之魁首,其繁荣景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郭延礼教授所言,在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中,翻译小说“不仅出现最早,数量最多,类型最全,而且于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最为显著,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翻译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受制于特定社会语境,受制于目的语国家的传统文化规范。特定的社会文化在各方面会潜在地制约着翻译的形式与内容、过程与结果,从翻译目的确定与翻译原本选择到翻译策略选择与语言表达方式,体现出特定时期的翻译文本特征。由于社会意识形态、译者主体价值观的操控,在原语转换成目的语的过程中,造成原语文化的失落、增添、扭曲与变形在所难免。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翻译活动也不例外,它无疑会受当时社会主流文化语境、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当时译者主体意识与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制约。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作用,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自然会表现出其自身的一些时代特征。本序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翻译小说种数与国别

一个时期翻译小说种数的多少可以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需求,而小说原本选择的国别频数则反映出该国在全球的文化地位与对译入语国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晚清时期,我国翻译小说种数之多,选译的小说国别涉及面之广,可谓空前。马祖毅根据当时可算是收录小说最多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统计出400种翻译小说,出版日期最迟为宣统三年(1911年)。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收有608种翻译小说。不过,这也只是涵盖光绪初年(1875年后)至宣统三年(1911)这一段时期的翻译小说。而陈大康著录的《近代翻译小说编年》(1840—1911)(未刊稿)一文,收翻译小说952种,涉及译者约400余人。而日本经济大学樽本照雄教授编著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年增补

版)以清末到民国初年为收录对象,共有翻译作品4974种,当然,这其中包括了一种作品的重版或再版。如果从1840年推迟到1919年,比较准确地说,翻译小说应该有2925种。如此说来,当时的翻译小说数量已蔚为可观。而且小说国别涉及了西欧主要国家,还有东欧、亚洲的日本和美洲。粗略统计一下,在2925种翻译小说中,可以查明国别的有1700多种。在查明国别的翻译小说中,以英美小说为最多,依次为法国小说、日本小说、德国小说,还有其他东欧的小国。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选择小说翻译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欧美强势文化国家,但也涉及了其他东欧一些弱小民族的国家。

晚清与民初翻译小说的盛行最直接原因恐怕是出于社会政治改良的需要。晚清时期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醒悟到:救国不能依靠官方的维新渠道,而是要依靠广大民众。梁启超正是为实施其政治目的,发动“小说界革命”,利用小说的教化功能来唤醒民众的思想觉悟。他(1902)指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这么登高一呼,召来应者云集,催生了当时翻译小说的繁荣。李伯元(1903)在其《绣像小说》创刊号“缘起”中明确表示:“欧美化民,多由小说……察天下之大事,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右,预测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新民之耳目。”(陈平原 夏晓虹,1989:51)在这些舆论宣传的导引下,时人试图借西方小说之力来改良中国社会政治不是没有道理的。梁启超力主翻译西洋小说的本意虽说是出于政治变革之目的,但他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解构与推崇西洋小说却为近代的翻译小说拓展了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当然,当时翻译小说的繁荣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比如,大众对西方小说的认同度,文学期刊的纷纷出笼为翻译小说的传播提供了媒介空间,以及留学人数的增加,等等。

二、翻译小说类型与译者的翻译趋向

选择不同的小说主题类型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鲜明的小说翻译趋向折射出不同译者的文化渴求。随着翻译小说的发展和繁荣,至20世纪初,翻译小说类型呈现多元态势。晚清时期,除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这几种主要类型外,还涉及了寓言小说、社会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家庭小说、卫生小说、冒险小说、人道小说、理想小说、警世小说、札记小说、爱国小说、侠义小说、女子探奇小说、顶怪诞小说、滑稽小说、婚事小说、伦理小说、农业小说、渔业小说,等等,不一而足。仅就上述小说类型而言,已经超过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小说的十

七种分类，可见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几乎已经囊括了所有小说类型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小说类型不外宣传帝王将相的历史小说、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英雄豪杰的英雄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宗教色彩的志怪小说等，文体形式较之西方小说要窄得多。晚清时期一下子引入了这么多类型的西洋小说也与梁启超刻意提高小说地位不无关系，正如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所强调的，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并将小说地位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一方面大肆宣扬外国小说对国家政界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力贬中国传统小说内容低级粗俗，“诲淫诲盗”，对社会日进一无是处。他的观点在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普遍认为有必要通过各种类型的小说翻译来输入西方新思想，创新传统小说。

与此同时，大量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特色鲜明的翻译家，译者的翻译趋向逐渐明朗化。梁启超首译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便与政治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特别强调政治小说的社会功能，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政治小说为功最高”。在其影响下，这个时期有许多学者翻译了日本的政治小说，比如留日学生周宏业翻译了日本矢野雄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熊垓翻译了《雪中梅》和《花间莺》，赖子翻译了《政海波澜》，忧亚子翻译了《累卵东洋》，阙翻译了《珊瑚媒人》，独立苍茫子翻译了《游侠风云录》，等等。陈景韩虽翻译过普希金的《俄帝彼得》、雨果的《卖解女儿》、大仲马的《赛血儿》等名家名作，但使其形成翻译特色并使他出名的还是他翻译虚无党小说，包括长篇小说《虚无党奇话》；中篇小说《虚无党》《女侦探》《爆烈弹》《杀人公司》《俄国皇帝》《白格》《绮罗沙夫人》等。他的译作多用白话体，译笔流畅自然，冷峻简洁，被时人称为“冷血体”。其后又有芳草馆主人、杨心一、路韵、觉民、周瘦鹃等译者投入了虚无党小说的翻译。周桂笙翻译小说虽不始于侦探小说，但他却以翻译侦探小说而闻名。他非常重视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之名是由他首先使用并为文坛沿用至今。他(1904)说：“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此外，奚若也以翻译侦探小说而著名。吴棣致力于俄国小说的翻译。阿英在《小说四说》中说：吴棣“在当时译家中，可谓真正能了解俄国文学者。”俄国著名文学家莱蒙托夫、契诃夫、高尔基的小说第一个中译本都出自吴棣之手。曾朴致力于法国小说的译介，他所译作品以雨果为最多，有小说《影之花》《马哥王后佚史》《九十三年》《笑的人》等，还翻译过莫里哀的《夫人学堂》、福楼拜的《马笃法谷》、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等。致力于法国小说

翻译的还有伍光建,他翻译了法国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侠隐记》《续侠隐记》和《法官秘史》前后编,他也是用白话文从事翻译的典范。还有以翻译科学小说而著名的徐念慈、周氏兄弟等。包天笑注意到教育小说对儿童教育和对小说创作具有积极促进意义,倾心译介西方教育小说。译者明确的翻译趋向不但拓展了小说的主题类型,而且对提高翻译质量也不无裨益。

晚清译者致力于某一类型或某一国别小说的翻译,一般来说,与其翻译目的和人生价值观不无关系。梁启超对政治小说情有独钟,完全是基于政治小说的社会作用。他(1898)认为政治小说能够将“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进而推动国家“政界之日进”。鲁迅先生早期翻译科学小说,看重的是其教化功能。他(1903)在《月界旅行》最后的《辩言》中指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对此,包天笑(1903)在其译作《铁世界》译余赘言中说得更明白,他认为科学小说是文明世界的先导,是输入文明思想最为快捷的方法。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社会市场因素,比如有的译者专门从事侦探小说的翻译,是出于侦探小说的新奇性、科学性和娱乐性而赢得读者的青睐,在市场上畅销,稿费获取快。另外,有的译者专门翻译某一国别的小说也可能与其知识背景有关。比如:曾朴自幼笃好文学,养成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曾在北京同文馆特班学习过法文。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结识曾经在法国侨居多年的陈季同。在陈指点下,三四年内集中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并阅读了许多法译的西欧各国文学名著,自云“因此发了文学狂”。于是翻译法国小说成为其“专利”。

三、翻译小说的转译形态

转译形态是清末与民初翻译小说的特征之一。“就翻译方向而言,转译是两种文本形态无法实现直接转换时借用第三种语言进行转换所产生的译作类型,是在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无法直接对应下发生的。”(姜秋霞,2009:73)当时社会的翻译市场需求与译者外语水平的失衡导致了这种转译形态。当时翻译小说大多并非直接译自原著而是通过某一国家的译本转译,尤其是从日文和英文译本中转译更为常见。比如,中国最早翻译的俄罗斯名家名著绝大多数是通过日译本重新翻译的,这包括首批留日学生戢翼翬翻译的普希金的《俄国情史》(今译《上尉的女儿》),吴棹翻译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第一部中《银钮碑》(今译《贝拉》)、契诃夫的《黑衣教士》、高尔基的《忧患余生》(今译《该隐与阿尔乔姆》),除此之外,转译自日文的其他国家的小说也很多,比如: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有半数以上是从日译本转译的,包括卢籍

东翻译的《海底旅行》(1902)、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1902)、包天笑翻译的《铁世界》(1903)、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3—1904)、佚名翻译的《空中旅行记》，等等。

从日译本转译在清末与民初时期的翻译小说中几乎成了一大特色，原因是留日学生大大多于其他国家，他们有机会接触不同国家小说的日译本。当然，也有不少小说源自英译文本，比如：周作人翻译的匈牙利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约卡依·莫尔的历史小说《匈奴奇士录》和《黄蔷薇》以及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等均转译自英文文本。另外，伍光建翻译的法国大仲马的历史小说，包括《侠隐记》《续侠隐记》和《法官秘史》前后编等，都译自英译本。这种转译现象也说明了我国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中掌握外语的语种并不广泛，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懂日文，或英文，很少有懂日英文以外的语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需求与译者外语水平不足的矛盾。这种转译无疑造成了译文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真实。

四、翻译小说的体例

相对于现当代翻译小说，清末与民初翻译小说存在着翻译体例上的不规范，主要表现为：

(1)原著者的姓名没有统一的译音。从日译文转译的欧美作家作品，中国译者根据日本译音去找汉字对音，拟译原作者姓名，同时还渗入了自己的乡土音，因此，造成同一个外国作家，有许多译名，差距很大。比如法国通俗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译入我国的有十多种，就有十几个不同的名字。薛绍微把他译为房朱力士，叔子译为裘尔俾奴，梁启超译为焦士威尔奴，包天笑译为迦尔威尼，商务印书馆译为焦奴士威尔士，等等。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在清末民初也有十来种名字。造成译名混乱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读音的不规范，正如高凤谦(1897)所说：“西人语言，佶屈聱牙，急读为一音，缓读为二三音。且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译。”

(2)译本多数不用原著书名和原作者姓名。日本人译欧美作品时改其书名，中国译者从日文转译，有时用日文书名，有时改为中国书名；译文初版本的书名，在再版时改换另外书名。比如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再版本改名《花心蝶梦录》；同种小说在同一杂志的不同期号上发表也会产生不同的书名，比如，《绣像小说》第五号上发表的《焦饶国》，在第八号上发表时改名为《汗漫游》。不署原著者姓名现象在当时也颇为普遍。从日译本转译的翻译小说常不

署原著者的姓名,只署日译者的姓名,甚至出现某译者著,混淆了译著与创作。

(3)不署译者姓名。比如,《绣像小说》一共出版72期,其中的翻译小说署译者名的只有寥寥几种。当时发表在《绣像小说》上的《天方夜谭》《环瀛志险》《华生包探案》《俄国包探案》《三疑案》《苦学生》等都未署译者的姓名。即使署名的也大多用别号,使用别号也是晚清翻译小说初期的一大特点。我国近代翻译的第一部英国长篇小说《听夕闲谈》的译者就署名蠡勺居士,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名冷红声笔述,晓斋主人口译。晚清一些比较著名的翻译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别号,如;陈季同别号为三乘槎客;包天笑的别号为天笑生;李宝嘉的别号为溉花客;沈祖芬的别号为跛少年;罗普的别号为披发生,等等。

当时翻译小说体例上的不规范,既有当时知识分子传统的做法,但其重要原因是当时译者思想深处对翻译的轻视,正所谓“盖不欲人知其姓名,而托为别号以掩真”,他们从事小说翻译的真正目的是出于思想启蒙,而不是艺术欣赏。

五、翻译小说的“归化”策略

晚清与民初时期,译者对翻译本质普遍认识不足,他们根本没有把翻译当作是艺术或是科学,只是把翻译当作一种“启迪民智”的手段,所以,翻译策略和方法上采用浓缩的“译意”手法归化译文(陆国飞,2007:171-177)。所谓“译意”,顾名思义就是将作品中的大意翻译出来,换言之,就是梁启超借用英国人所谓的“译意不译词”,只译小说中的主要故事情节,而小说中的大段的景色描写和人物的心理描写删去,有时还会添加译者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并加以发挥。产生这种“译意”现象与当时的翻译目的有关。当时翻译外国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思想启蒙和政治宣传,而不是为了艺术欣赏,故而但凡遇见与译入语文学规范、语言规范、文化规范、社会规范、伦理规范等不一致的地方,译者往往将作品中的主题、结构、人物一般均毫无顾忌地改造一番,或删节,或增补,全文逐字逐句翻译的极少;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记忆,把原小说中的人名、地名一律改为中国名;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译者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程式和故套。比如译著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每回加上了回目,如小说《小仙源》第一回目は“遇飓风行船触礁,临绝地截桶为舟”,翻译小说常以“话说……”起始,不时插入“看官”之类的词语。每回结尾是中国典型的话本式样。比如《焦侥国》第一回结尾是“……正是:密计方思离虎

口，闻声又复动狐疑，欲知此声何来。且听下回分解。”普遍出现这种“译意”现象，究其原因恐怕是许多译者本人又是文学家，能用娴熟的文学创作技巧去归化外国小说中的表现手法。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译者轻视外国文化的心理因素，认为在文学上外国不如中国，应该顺应中国的主流文化，抵制异化，从而确保译文的透明性和流畅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译者捍卫了民族语言的纯洁性。

还需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大多采用文言文或浅近文言归化译文。比如林纾翻译的180余种外国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文言文，上文所提到的翻译小说采用文言或浅近文言的占了绝大多数。清末与民初译者多数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古文功底深厚，传统的文学观念根深蒂固，轻视白话这种世俗语言文字。就连倡导使用白话的先驱梁启超和鲁迅先生等早期都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的，觉得用文言翻译更顺手，更不用说其他晚清知识分子了。由此可见，当时翻译小说的文言译文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六、翻译小说的序跋

文前序与文后跋是当时翻译小说的又一特色。现当代的翻译小说中的译序一般先是介绍原作者的生平，然后是小说的故事梗概，很少有类似于清末与民初翻译小说跋的译后记，即便是有，通常也是叙述译者本人是如何完成译文以及答谢之类的客套话语。与此不同，当时译者往往利用译文序跋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与翻译观、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以及小说的思想性等。比如，梁启超在《十五小豪杰》的译后语中说明了该小说为日文转译，采用的翻译体例，并声称与原文的忠实性，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译者往往在译文的序跋中把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小说内容联系在一起，引导读者去体悟其中的政治意义。比如，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和跋中就分别提到：“是书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哱嚙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幸甚！”（转引自陈平原等，1989：27）、“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转引自陈平原等，1989：28）这一番话语无疑具有煽情作用。

清末与民初时期的译文序跋不同译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用例言，有的用识语，有的用弁言，也有的用译后语；有的用凡例，有的用小引，也有的用附记；等等。总之，这些类似于前言的文前序和类似于后记的文后跋也是当时翻译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翻开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多半会读到译者的序与

跋，它们为我们翻译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材料，其中的内容和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限于篇幅，笔者另文阐述，在此暂不赘述。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清末与民初的翻译小说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翻译小说文体。由于当时译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不足、特殊的翻译目的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忠实性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历史价值。对于该时期的翻译小说，我们不能仅从技术层面来考察其成绩与不足，应将其纳入中国整个翻译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更重要的是要将其纳入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文化接受史中加以考察，探讨其在人类跨文化系统交流的桥梁作用，分析其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对于清末与民初译者究竟是怎样的群体，他们题材选择的标准如何，该标准又从何而来，小说翻译的整体态势以及传播状况如何，翻译小说究竟是怎样影响近代小说创作的？翻译策略又是如何形成的？当时的重要作家怎样以翻译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微观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总之，如果我们要整体把握我国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关系，要了解中国的“新小说”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清末与民初翻译小说研究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槛。

目 录

1. 政治小说	1
2. 科学小说	9
3. 侦探小说	26
4. 言情小说	102
5. 社会小说	151
6. 滑稽小说	175
7. 历史小说	184
8. 军事小说	193
9. 冒险小说	202
10. 童话小说	211
11. 神怪小说	217
12. 爱国小说	224
13. 义侠小说	230
14. 教育小说	237
15. 家庭小说	242
16. 传记小说	246
17. 寓言小说	250
18. 伦理小说	255
19. 宗教小说	259
20. 笔记小说	264
21. 外交小说	267
22. 医学小说	270
23. 奇谈小说	274
24. 虚无党小说	277

25. 励志小说 280

26. 实业小说 282

27. 其他类型与未标注类型的翻译小说 284

参考文献..... 406

书名索引..... 409

跋..... 457

1. 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这一说，最初源自英国，由梁启超从日本首次引入中国。学界一般认为，开创“政治小说”这种文类的典型代表为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年)，在其还未涉足政坛时，曾出版过其第一部政治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另一位是曾任过英国国会议员的布韦尔·李顿(Bulwer Lytton, 1803—1873)。“政治小说”采用叙事的方式评论政治时事、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小说”时常运用讽刺、经常以乌托邦和非乌托邦体裁出现，直接抨击现行社会，它与社会小说、无产阶级小说和社会科幻小说有类似之处，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清末民初时期政治小说是人们意识形态的反映，它是当时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它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也是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的具体表征。本部分根据当时发表和出版时标注的“政治小说”字样的翻译小说，共收录26种。

1-1《波兰之党人》(政治小说)

(英)斯考脱南氏著，恸尘译。1916年3月，《小说大观》第5集刊载。上图有馆藏。

1-2《柏林公中之电报室》(政治小说)

(国别未题)著者未题，毋我译。1914年12月下旬，《娱闲录》第11期刊载。四川省图书馆有馆藏。

1-3《不疯人院》(政治小说)

(国别未题)著者未题，东侠、嘯侯同译。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911.9.17)，《小说月报》第2年第7期刊载。又，1914年3月，《说林》第4集刊载。上图有馆藏。

1-4《残蝉曳声录》(政治小说)

(英)测次希洛著，林纾、陈家麟同译。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编入《林译小说丛书》第2集第8编。又,1914年11月17日、1915年8月16日,商务印书馆分别再版,编入《说部丛书》第2集第40编。

【译者简介】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举人,官教习,考进士不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习。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曾创办“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晚年居北京,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林纾一生译作甚丰,共译小说超过213部,翻译小说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其他还包括有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兰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柯南·道尔、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伊索、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资料参考来源:《中国翻译家辞典》)

1-5《长春城记》(政治小说)

(英)霍尔凯著,秋心馆主人译述。1913年11月—1914年1月,上海《华侨杂志》第1期连载至第3期。

1-6《党人血》(政治小说)

(英)菲廉赫勃著,小青译。1914年《游戏杂志》第13期刊载。

【译者简介】小青(即程小青),上海市人。又名程辉斋、程青心。幼年丧父失怙,由于家道清寒,仅读私塾数载,便辍学到上海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又由于生性早慧,平素专意博览群书,勤于写作,并自学英语,故16岁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15年起开始翻译生涯,翌年由沪迁居苏州,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执教,兼任《侦探世界》(世界书局出版)等文艺刊物编辑,专事于侦探小说的创作和翻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拒绝替日伪效力,曾改名程辉斋,转到上海正养中学任课,抗战结束后,主编侦探小说期刊《新侦探》,其间,除整理出版《霍桑探案丛刊》(世界书局出版)外,又有数十册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作问世。建国后,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常委。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1956年调离教学岗位,专事于写作,直到辞世。程小青系我国现代作家、侦探小说翻译家。数十年来,曾创作出数量

庞大、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的侦探小说，以及 30 部电影剧本，同时，还翻译了多集侦探小说，其中主要的译作有：《福尔摩斯探案》《斐洛凡士探案》《奎宁探案》《陈查理探案》《圣徒奇案》《柯柯探案》等。此外，还创作数量丰富的散文、诗歌、杂文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文汇报》《雨花》等报刊。（资料参考来源：《中国翻译家词典》）

1-7《俄国之红狐》（政治小说）

（美）堪能著，冷（陈景韩）译。1915 年 9 月 1 日，《中华小说界》第 2 卷第 9 期刊载。又，1916 年 10 月，上海·文明书局、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小说名画大观》（胡寄尘编），本篇收于其中。北图有馆藏（影印）。

【译者简介】陈景韩（1878—1965），又名陈冷，笔名冷、冷血、不冷、华生、无名、新中国之废物等。松江县人，家住西城门内。清季秀才。光绪二十六年（1900）经钮永建介绍，进武昌武备学校。后因参加革命会党，被清政府侦知，由两湖总督张之洞饬松江知府捉拿。陈父闻讯，恳请松江士绅设法向张之洞疏通，才得免于缉捕。乃赴日本暂避。光绪三十年回国，初任上海《大陆报》记者。后《时报》在上海创刊，受聘为该报主笔，于是锐意进行业务革新，除创设“专电”“特约通讯”等专栏外，还开辟“时评”专栏，每日写一短评，针对当时收回粤汉铁路权的斗争和抵制美货运动等事件，抒发议论，短小精悍，令人耳目一新，各报纷纷仿效。又善写小说，曾和包天笑合编《小说时报》（月刊）。民国 2 年（1913），史量才接办《申报》，受聘任该报总主笔。主张以爱国爱民、独立不偏为立场；以“确”“速”“博”三字为办报要点；慎选记者，发布真实可靠的新闻和明白公正的评论，因此成为舆论界权威之一。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他即在申报连续发表时评，反对帝制，拥护民主共和。民国 13 年，浙江军阀卢永祥和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预谋发动战争，景韩撰写题为《戎首》的时评，指出先动手者即为罪魁祸首，表达了民众的呼声。《申报》在史量才和他的合作下，成为经济独立、业务发达的全国著名报纸。民国 16 年后，对蒋介石控制、检查新闻等政策不加反对，和史量才时有争论。民国 19 年冬，辞去《申报》总主笔职务，担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申报》由国民党 CC 系掌握，请他续主报事，坚决不应。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著有小说《新中国之豪杰》《商界鬼域记》《凄风苦雨录》《白云塔》（一名《新红楼》）等。其翻译的小说胡适赞誉说：“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译作有《明日之战争》《新蝶梦》《卖解女儿》《赛雪儿》等。（资料参考来源：互动百科）

1-8《飞艇一夕》(政治小说)

(国别未题)莫雷尔·A·波利斯芬(MURREL A·POLLEXFEN)著,茗狂译。1915年12月1日,《小说大观》第3集刊载。上图有馆藏。

【译者简介】茗狂(即赵茗狂)(1892—1953)名泽霖,字雨苍,号茗狂,别号忆凤楼主,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早年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读的是电机系。大东书局开业请他当第一任总编辑,以后,又被请到世界书局,任17年总编。在任上海世界书局主编时,他曾用顾问之名帮助了多位当时积极进步的文化名人,他参加过柳亚子的南社,在南社社友著述存目中,赵茗狂条目下有25种书,传奇类、侠客类、侦探类居多,属典型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而由他主编的《红玫瑰》杂志历时九年,影响力非凡。赵茗狂从事小说创作,并先后主编《四民报》《游戏世界》《红玫瑰》《金刚钻》《新上海》《玫瑰》等刊物。(资料参考来源:百度百科)

1-9《红手党》(政治小说)

(国别未题)著者未题,树声译。1916年,《小说新报》第2年第11期刊载。

1-10《花间莺》(政治小说)

(日)末广重恭著,译者未题。1903年,上海出版(出版社不详)。又,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1908.9.15—1909.5.9),《福建法政杂志》第1卷第4号连载至第2卷第3、4号,署:“(日)(末广)铁肠居士著,梁继栋译意”。

1-11《回天绮谈》(政治小说)

(国别未题)著者未题,无名氏译。无版年与出版社,线装本,共14回。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1903.6.10—8.7),《新小说》第4号连载至第6号,共14回,署“玉瑟齐主人译”。又,1905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共14回),署“(日)加藤政之助译,玉瑟齐主人重译”。上图有馆藏。

1-12《回顾》(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1888)(政治小说)

(美)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著,译者未题。1904年5月15日—10月23日,《绣像小说》第25连载至第36期,共14回。又,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署“商务印书馆译”。又,1905年2月,中国商务印书馆再版,编入《说部丛书》初版第2集第2编。又,191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又,1914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编入《说部丛书》初集第12编。其实本篇最早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八年三月